



伯乐是忘年交

年轻的,叫傅雷(1908-1966),我国知名作家、翻译家、艺术评论家;年长的,叫黄宾虹(1865-1955),大器晚成的典范,在孩童时就开始学画,到古稀以后才渐为人知,在国画界被称为一代宗师,开宗立派,对传统山水画改革,影响巨大。

傅雷在1927年留学法国攻读文艺理论,同时自学美术史。1931年他和刘海粟一起回国,合编了《世界名画集》,并接受刘海粟的邀请到上海美专教美术史,其间翻译了《罗丹艺术论》。1933年他从昆明艺专返沪,以翻译为生。

据好友杨绛先生回忆,她曾劝傅雷到清华大学任教,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1943年,傅雷给黄宾虹写下第一通书信表达崇敬之后,大致介绍了自己对艺术的鉴赏兴趣和主要观点,并对黄宾虹作品予以精准的高度评价:“蕴藉深厚,直追宋人,而用笔设色仍具独特面目。”“直追宋人”正契合黄宾虹当

## 傅雷、黄宾虹:一文一艺 相得益彰

他二十几岁时,与六十多岁的他相识了,分隔京沪两地,也没多少联系;在他三十几岁时,偶然见到他的画作,十分喜爱,重新开始与他联系。两人年龄相差四十三岁,一起探讨艺术,见解趣味相投,互相引为知己,从此结下“千古不朽”的友谊。

时在山水画创作上的一条重要艺术追求:上追宋元正统,傅雷对黄宾虹山水画的品鉴可谓高山流水般心领神会,因此黄宾虹对傅雷时有知音之感。

而在此之前,黄宾虹一直勤奋作画,淡泊名利。

傅雷文字富有感染力,翻译传神,赋予了作品崭新的生命,把人带入美的境地。后人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两人艺术修养都很深厚,有着共同的追求。一个创作,一个评论,相得益彰。

也在1943年,黄宾虹门生代为筹办个人书画展览会受到重重阻碍。傅雷闻之,极力主张在上海举行黄宾虹个人书画展览会,并自揽操办、宣扬之责。

画展由傅雷、顾飞和裘柱常(顾飞丈夫)倡议发起,他们忙前跑后办理各项事宜。傅雷担任总策展人,可谓不遗余力,从作为联名发起人联系艺坛名家、印画册、布置会场、迎接来宾,到引导观众欣赏画作、作现场导览、推广售卖画作、记录售出情况……事事尽

责,并及时汇报给远在北京的黄宾虹。

傅雷一生宣扬黄宾虹,是黄宾虹艺术的重要推手。作为艺术评论家,他既有西学的背景,对传统文化认识也相当深刻。他更是黄宾虹的伯乐,认为黄宾虹不仅是传统的集大成者,还是未来的开拓者。

### “平生一大知己”

傅雷总结中国艺术最大的特色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雍容有度,讲究典雅。”这也是中西高级艺术共同的准则,而黄宾虹一生的艺术实践,创造性地继承传统,师自然造化,从笔墨中化出自然情趣。黄宾虹的山水画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他的作品既有江南水乡的宁静之美,又有名山的雄伟壮观。在他的画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深厚的内涵,那种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热爱。黄宾虹的代表作有《山居烟雨》《新安江舟中作》《富春江图轴》《峨眉龙门峡》等,他被称为近代十大画家之一,与齐白石齐名,并称为“北齐南黄”。

傅雷曾评价黄宾虹的画,

“宾虹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历代名家精华之大成,而构成自己面目。他的概括与综合的智力极强,所以他一生的面目也最多,而成功也最晚,六十左右的作品尚未成熟,直至七十、八十、九十,方始登峰造极。”

1955年初,傅雷正忙于翻译巴尔扎克的《于絮尔·弥罗埃》,突然获悉黄宾虹病重,致以问候,可惜信来得太迟了。当接到黄宾虹逝世的消息,傅雷再次致信宋若婴,表达未能在黄病重期间探望的遗憾,并寄以哀思。傅雷在黄宾虹离世后,一直操心黄老身后的各种事宜,包括艺术遗产的保存、著作的整理、纪念馆的落成开放等等。而黄宾虹保存有完好的傅雷书札多达一百二十一通。在他的最后岁月,经常对人提起傅雷是“平生一大知己”。

傅雷与黄宾虹的交谊,不仅仅是画坛“佳话”,它更是研究近现代美术史的宝山。(综合人民网、文汇网)



老记(十)

## 392张车票,找奥运冠军报销

北京时间8月8日,中国运动员王宗源在巴黎奥运会跳水男子单人3米板决赛中发挥出色,摘得银牌。这是王宗源继男子双人3米板夺金后,在本届奥运会上拿到的另一枚奖牌。

“1、2、3、4、5……”8月10日,日在湖北襄阳市襄城区唐家巷社区王宗源的家中,其父母与记者正一张一张清点。

2008年7月22日22时40分发车,1189次,票价25元,无座——

那是王宗源刚到武汉市洪山跳水学校后的第8天,思子心切的妈妈赵毅从襄阳一路站了6个小时,到武汉看儿子。

2011年10月24日2时22分发车,T248次,票价51元,硬座——

那一天是王宗源10周岁的生日,王迎飞、赵毅夫妇披星戴月赶到武汉,看一堂训练课,吃一顿生日餐,当晚11时又急匆匆赶回襄阳。

2018年6月26日20时57

分发车,K820次,票价148.5元,无座——

那是王宗源入选国家队后,父母第一次去北京看他,全程19个小时,妈妈依靠在行李箱上,爸爸铺张报纸席地而坐。

从红色软纸票到蓝色磁芯票,从普速绿皮车到洁白和谐号,从无座、硬座到卧铺、二等座,一切在变,不变的是跨越整整16个春秋的思念与牵挂。

最早的一张票是2008年7月22日22时40分的无座车票,“才7岁啊!就一个人在武汉,哪能放心?几乎每周跑一趟。”为了不影响工作,夫妻二人经常选择周五深夜出发,周六一早到武汉,周日深夜再从武汉返回,周一上午正常上班。“那时家里条件一般,几乎都是硬座往返。”

最多的一年是2013年,一共81张车票。

刚开始夫妻两人还会走进跳水馆看看儿子的训练,后来就只剩下王迎飞一人,赵毅则在馆外等候。“不忍心,那时娃子刚进

省队,身材有点胖,所以教练对他要求更高,练得更狠。”

每次发现儿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并绑着绷带时,赵毅都心疼得直掉泪:“说真的,现在回想起这些,我还是想哭。”

她曾不止一次跟儿子说:“实在坚持不下去,就放弃吧!”王宗源每次都是同样的回答:“练了这长时间,吃了那么多的苦,哪能放弃?”

再后来,动车开通,从襄阳到武汉需要3个小时。出发前赵毅总会煲一锅儿子心心念念的山药排骨汤,然后装进保温桶带到武汉。“等到训练结束,盛一碗热汤给他喝。”

2017年,陪着父母在海南旅游的宗源接到国家跳水队调令正式进入“梦之队”,“一方面北京比较远,另一方面国家队训练抓得更紧,每周训练6天半,只有周日下午能调整休息,所以就去的少了。”

赵毅说上一次见到儿子还是在4月份的2024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西安)的赛场上。



8月9日15时,远在巴黎的王宗源打来微信视频:“爸妈,我挺好的。有遗憾,但也坚定了我再战4年的决心。”电话那头的儿子面带微笑电话这端的父母泪流不止。

捏着车票,赵毅说:“去的时候不累,想着马上能见到儿子了,兴奋着呢。回来不行,不光是累,我掉眼泪,他心里发酸。”

16年间奔波500多次,一张张薄薄车票浸润着满满的思念,而王宗源没有令人失望——9岁获得全国冠军(少儿组),10岁进入湖北跳水队,16岁进入国家队,20岁初登奥运一金一银,23岁再战奥运一金一银。

“等他回家了,找他报销。”儿子出色的成绩,让赵毅笑中含泪。(据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2024.8.12)

## 《世界遗产名录》中的石窟近半在中国

### 石窟的起源和演变

从广义角度看,石窟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诞生有关。洞窟是人类最初的居住空间和艺术空间,存在于从原始时期到现代社会的文明进程之中。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壁画、浮雕,都是在洞窟中诞生,如距今一万多年的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

今天,作为人类文明遗产的石窟,主要指佛教石窟,多与佛教实践相关。开凿于东汉年间的新疆喀什三仙洞,很可能是中国境内现存最早的佛教石窟;同期四川乐山也出现与墓葬相结合的崖墓佛教石窟;在新疆库车一带,出现一批以居住和修习禅定为目的的石窟,墙上画满壁画。

公元5世纪,东亚、中亚、南亚进入修建佛教石窟的高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20余项石窟遗址,近半位于中国。中华大地上的各类石窟,璀璨如繁星;不仅记录着佛教中国化的轨迹,更展现了中外文明交流的历程。

潮。印度最具代表性的阿旃陀石窟,其大规模建造年代正是5世纪,与中国敦煌石窟、云冈石窟相同,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和周边石窟也于同期修建。可以说,佛教石窟的起源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点出现的,是在石窟居住修行的生活方式被普遍接受后,各地因地制宜创造实践的结果。

2014年,克孜尔石窟、麦积山石窟和炳灵寺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因为当时这些地区的人们有共同信仰、

生活方式,产生了石窟这一共同的文明成果。

### 中国为何如此多的石窟

石窟能在中国广泛存在,主要有三点原因。

一是石窟的建造,契合中国人自古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在自然山水之间开凿石窟,汇聚天地之灵气,修行,恰好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维方式和哲学理念。

二是石窟的居住环境,符合中国人中庸的处事态度。中国古人注重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保持平衡,我们常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古代圣贤



既离群索居,又并非完全脱离社会。中国石窟开凿会选择既有利于生活、修行,又离人口聚集区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正符合当时修行者的需求。

三是石窟中的艺术创作,凸显中国人重视历史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十分注重历史的记录和传承,通过佛经、壁画、雕塑等创作,人们把神的事迹、自身信仰和情感刻到墙上、置于洞中,不仅供人敬仰,还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据中新社 崔白露、徐雪莹/文)

## 《唱支山歌给党听》背后的故事

1963年,雷锋同志逝世后的第二年,毛泽东为雷锋同志题词,并号召全国上下向雷锋同志学习,掀起了一场学习雷锋的热潮。也是在那一年,雷锋日记里一首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曲传唱大江南北。

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歌词就是雷锋所写,后来经过考证,认为歌词是雷锋从报纸上摘抄的一首诗歌。那么这首诗歌到底是谁写的呢?

几经周折,有关部门终于获悉,歌词系陕西省铜川市焦坪煤矿技术员姚筱舟(笔名“蕉萍”)所写,并派人到矿区调查了解。当时,心情复杂的姚筱舟一开始怕惹事并不承认自己就是“蕉萍”,经过大家耐心解释,他最后才肯定地回答歌词是自己写的。至此,《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才真相大白。

姚筱舟16岁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后入朝作战。回国后被分配到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姚筱舟被誉为“矿工诗人”,他在焦坪煤矿工作了28年,写下了大量以矿山、矿工为主题的诗歌、散文。

1958年,姚筱舟创作诗歌《唱支山歌给党听》。诗的全文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姚筱舟不敢署自己的名字,就以单位名称的谐音“蕉萍”为笔名投稿,诗歌发表在《陕西文艺》杂志“总路线诗传单”专栏里,后来又被中国青年出版社汇编入《新民歌三百首》一书中出版发行。

1960年1月,雷锋偶然看到了这首诗,被诗中真诚、质朴的情感所打动。回想起自己苦难的童年和翻身解放的日子,雷锋不禁感慨万千。他怀着对党的感情,将“母亲只能生我身”一句改为“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并省略了最后四句,整齐地抄录在了日记本上。

雷锋同志逝世后,《雷锋日记》被编印成册全国发行。1963年,上海实验歌舞剧院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在书中读到了雷锋抄下的这一段文字,被深深感动,于是为其谱曲,歌曲由任桂珍首唱。

(据“学习强国”客户端)

“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的劈头问,更是叫人难以置答。然而梁启超答得更妙:

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

这一联以“三教”对“四水”,以“三才”对“四时”,句中嵌入自己身份“儒人”,再以“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巧对“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表意含蓄深远,既挫了对方傲气,又不失宾主之礼,张之洞为之叹服不已。

此联既包含四水,又总括四时,且嵌入地名“江夏”,而



## 『马踏飞燕』不拍正面照有缘由

汉代,马的雕塑和绘画有很多,这跟马的历史地位有关。那时,不管是交通还是战争都离不开马。然而,那么多马的雕像与绘画,人们却很少能看到马的正面像,为什么呢?

甘肃省博物馆的青铜“马踏飞燕”,是镇馆之宝。它出土于甘肃武威的东汉将军墓,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雷台汉墓。

“马踏飞燕”从侧面看,真是一匹雄健、灵动的骏马,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那么完美,腾空而起的四足、脚下回望的鸟儿,仿佛在看,那匹马有没有追上我呀?

这么完美的一匹骏马,当你慢慢绕到前面时,却是“三观尽毁”——只见它侧歪着头,瞪着大眼,一半是白眼仁儿,张嘴大笑,露出一口雪白的大牙,仿佛得意地对脚下的鸟儿说:“嘿嘿,受我一脚!”

西方的天马一定要有翅膀,而我们只需要在马的脚下放上一只鸟,就很好地解决了天马的问题。(据央视网)

(摘自《新周报》吴从松/文)